

创新与转型的 社会基础

朱旭东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创新与转型的 社会基础

朱旭东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创新与转型的社会基础/朱旭东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 - 7 - 208 - 10549 - 2

I. ①创… II. ①朱… III. ①技术革新—研究—中国
②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F124.3②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8199 号

责任编辑 顾兆敏

封面设计 陈楠

创新与转型的社会基础

朱旭东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0.5 插页 4 字数 330,000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0549 - 2/F · 2088

定价 38.00 元

自序

长久以来,笔者一直有一个心愿,想就创新和转型这样“专业性”很强的话题写一本面向大众的书籍,也就是说就这个严肃的话题写一本畅销书。抱着这样的愿望,自六年之前就开始构思,其间断断续续地写一些,但始终不成体系。2011年5月,笔者应邀去上海图书馆就此主题做了一次周末市民讲座,讲座录音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后,得到的热烈反响让笔者深受鼓舞,于是经过当年夏秋六个月的苦干,书稿基本成型,自己本以为一本畅销书就要问世了。

既然定位为畅销书,一般少不了要请名人贤士写个序。可是笔者将书稿送给几位朋友看过后,其中一位说,这本书不可能成为畅销书。因为在本书中,审视转型和创新的视角以及由此得出的核心观点,与当前社会主流的看法不一致。就内容看,搞技术的人可能觉得书中关于社会、人文、历史的内容太多了;搞社会、人文、历史的人又会认为书中关于经济发展的内容太多了;搞经济发展的人又会认为书中批判现实的色彩太浓了,几不靠边。就书稿的难易程度看,专家可能认为太浅,看起来没劲;市民又感觉太深,看起来费劲,总之较难调和。如果说要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或理论体系吧,作者的知识积累不够,学术声望又太低,似不现实。这位朋友的话,无异于给笔者泼了一盆冷水,甚至有了要取消出版的念头。然而,中国的读书人自古就有“敝帚自珍”的习性,笔者也不例外。于是笔者降低了期望值,并鼓起勇气,几经修改,将书稿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中国,转型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更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的近代化转型,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几百年,中国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陷于集权统治、小农经济、家族社会与伪儒家意识形态“四位一体”的漩涡中不能自拔,国力不断衰竭。英帝国主义者携船坚炮利之威,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迫使中国开始转型。转型的第一

阶段是观念转型,从虚妄的“天下宗主”幻境中逐步清醒过来,认识到西洋各国的实力在中国之上;第二阶段是洋务运动,通过兴办实业,引进西洋技术人才、设备和相关制度,意图在实力上实现对西洋各国的赶超;第三阶段是政治改革,这是在遭遇甲午海战惨败以后,部分精英人士认识到政治体制是富强之本,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无法凝聚人心,也就无从实现富强。政治改革既包括“戊戌变法”,也包括此后相继进行的立宪运动。由于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政治改革缺乏足够的动力,最后改革也就不了了之。第四阶段是体制革命,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自鸦片战争至中华民国成立,总共用了 71 年的时间,其间中国一直在转型,但始终没有找到撬动转型的杠杆。

与多数精英人士的预期不同,中华民国的成立,没有让中国实现进步和富强,反而拉开了近 20 年的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序幕,把中国推向了更加苦难的深渊。此后,自 1931 年起经历了 14 年的日本侵华战争,自 1946 年起经历了 3 年的国共内战,直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大地上才基本结束战争状态。自中华民国成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血火交织的 38 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底层人民得到了有效的组织,为转型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自中国共产党执政至今的 63 年间,中国的转型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的 GDP 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产业结构中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显著地超过农业,标志着中国不再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法治和民主的初步实现,标志着中国不再是集权统治的国家;人的社会意识和流动性的显著增强,标志着中国不再是一个家族社会的国家;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的多元化,标志着伪儒家意识形态已经退出了历史主流。因此,可以说中国已经基本走出了“四位一体”的漩涡。至此,离鸦片战争已经 172 年。

在这不平凡的 172 年中,中华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政治、经济、法治和社会系统和 172 年前相比,取得了脱胎换骨式的进化,人的素质和国家竞争力有了历史性的提高。如果按照纵向对比的思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中国转型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自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开始具备了国际眼光和国际思维。如果在国际上做一个横向对比,我们对中国转型的成就就会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国家的竞争力基本是原地踏步。国家的实力和国家的竞争力是不同的概念,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在世界上依然是屈

指可数的,然而,由于竞争力低下,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172年过去了,中国在国际交往和利益博弈中的被动依然如故,说明中国的竞争力基本没有伴随着转型而提升;其次,人民的幸福指数基本原地踏步。无论是皇权时代、资本主义时代还是现代,统治者在理论上都是要关注人民福祉的,当然在实际上往往是南辕北辙。尽管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家实力取得长足的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但是盖洛普的一项调查显示,人民的幸福指数基本没有提高。这说明国家的发展方式存在严重的问题,调整发展方式的任务还任重而道远。再次,社会公平的程度基本原地踏步。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石,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更是转型和创新的终极推手。当前存在的社会矛盾,就是在不断地告诫我们,当今社会公平所取得的进步甚微。尤为令人不安的是,随着发展出现的新的不公平,势头越来越明显。以上三个“原地踏步”说明转型的任务离“功德圆满”还有极大的距离。

对照我们的邻国日本,会使我们爱恨交织的情绪多了一层别的东西。在中国发生鸦片战争后不久,1853年美国的佩里将军率“黑船”舰队造访日本,成为日本进行近代化转型的引信。国内外各方势力进行了15年的博弈,促使日本于1868年宣布进行明治维新,确定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线路图,并在1900年前后建成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国家,成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后起之秀。这段历史只用了47年的时间。日本在“二战”中成为战败国,遭受毁灭性打击,几乎被夷为平地。然而日本从1945年至1965年,仅用了2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复兴。当前,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已经风光不再。其实不然。日本在“3·11”地震以后,由于其为世界提供核心部件的工厂受到影响,使得苹果手机和中国许多汽车公司的生产受到连累,这就体现了日本在产业方面的核心竞争力。用国家竞争力、人民幸福指数和社会公平程度来衡量,日本的水平远在中国之上,日本确实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高科技为特色的知识经济在美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于是创新的口号响遍全球。中国自1986年起进行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创新运动,自2006年起“建设创新型国家”被确定为基本国策之一。美国的创新是植根于美国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一种创造财富的方法。然而,由于中国对创新本质的认识存在偏差。创新战略被定位于“技术决定论”为核心的政策体系。在美国,创新是全民的事业;在中国,创新是精英和高端人才的事业;在美

国,创新是创造财富的主力;在中国,创新是消耗政府财力和政策资源的机器。中国大陆创新政策对于创新本质的响应程度,不仅离美国甚远,甚至远远比不上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和香港地区。有一项统计表明,中国大陆高科技产业的平均增加值率,低于传统产业的增加值率。正是因为高科技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增加值率倒挂,才造成中国大陆没有像美国那样,依靠高科技产业创造的财富在世界上独占鳌头;也造成中国大陆没有像日本、韩国以及台湾、香港地区那样,在跟随式发展的道路上,让创新成为产业竞争力的利器,成为经济起飞的动力。

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来,科学和技术在中国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虽然中国的技术进步成就显著,但是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逐步降低却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专家指出中国创新体系存在的问题是“科技与经济两张皮”,这个判断有一定的深度,也衍生出了“科技成果产业化”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一系列的政策。问题是,多年过去以后,增加值率倒挂的问题依然没有改观。于是许多经济学家把问题的焦点归咎于制度,问题是制度改革的进度似乎永远也赶不上时代的需要。现在,人才工作又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口号,问题是对部分精英人士的选择性“重视”,似乎在压制更多人奋勇争先的激情和潜力。根据笔者的观察,中国在近代化转型的前 71 年中没有找到撬动杠杆,至今仍是如此。

撬动转型的杠杆是什么?笔者认为,创新是转型的原因,转型是创新的结果。财富创造是大国崛起的经济基础,也是强国富民的最终源泉。转型有以下四个互为因果的层次:

第一是区域发展动力的转型。当前中国各地发展似乎只有一个动力,那就是招商引资。这样的发展模式,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招商引资是中国发展速度的钥匙,同时也是国人利益边缘化的主因。在招商引资和自主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是当今中国转型的根本问题。只有当自主发展的力量成为主流,也就是国人创办的企业成为 GDP 的主要组成部分,发展的利益才能成为国人分享的盛宴。而在国际产业竞争的背景下,国人创办的企业要立得住,就一定要在企业增加值率这个核心元素上达到新的境界。而企业的增加值率要达到新境界,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系统工程,也需要诸多前提条件。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依靠招商引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话,现在走招商引资这条“捷径”的前提条件基本不复存在,而且我们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实力,

完全应该把动力转型置于首要位置,从而走出一条能够使国民利益最大化的发展道路来。

这样就牵扯出转型的第二个层次,即微观主体能力的进步。微观主体包括企业、投融资体系、消费者、政府、产业等13个因素。让我们做一个国际对比,假如我们的眼光足够客观,就会发现我们的微观主体的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巨大的。正如围棋一样,棋手的博弈水平从不入流到九段,不同层级的棋手博弈水平是不同的。当前,我们在国际外交和经贸交往中的被动局面,在本质上是由于微观主体的能力不对称造成的。假如国人和政府不能以卧薪尝胆的精神,在提升微观主体的能力上痛下功夫,很难指望转型之路能云开日出。

第三个层次是制度的优化。西方国家的创新和转型基于西方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和进化力,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又促进了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和进化力。中国已经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及数目繁多的法律条文、规范性文件和部门规章。接下来的制度优化,就是要在进一步贯彻公平的原则基础上,建立低成本的纠正不当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不断优化,将为持续地推动转型和创新提供切实的保障。许多专家批评中国的改革在走回头路,反映出近年来中国制度优化的进程比较迟缓。其实,许多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不明白,从长远看,制度优化的结果,也是符合他们的最高利益的。因此,制度优化的阻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于反对优化的既得利益者的眼界狭窄造成的,这就衍伸出转型的素质层次。

第四个层次是国民素质的转型。国民素质包括政府官员的素质、企业家的素质和公众的素质。当然,如果把公众再细分,还可以列出许多门类。就中国当前的创新和转型而言,抓住了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素质的提升,就抓住了关键。素质包括技能、眼界、思维、操守和进取心五个维度。在中国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素质结构中,技能维度上的素质属上乘,眼界与思维维度上的素质属平庸,操守和进取心维度上的素质属低劣。素质转型的关键,就是要把眼界、思维、操守和进取心的短板补足,使中国拥有大批五个维度均衡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从而使中国在国际上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实现大国的复兴。

素质转型是撬动创新和转型的杠杆。我想不是因为没有人想到过这个逻辑,主要是因为人的素质转型之难,特别是以全体公民为样本来推动素质转型之难,使得许多施政者不愿意去啃这块硬骨头。笔者很多时候都不由自主地想起

毛泽东同志号召的一种精神,即愚公移山的精神。面对全体人民的素质提升这样艰巨的任务,需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无论是转型还是创新,素质转型都是绕不过去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都是以华人为主体的社区,在各种历史机缘的助力下,加上自身的努力,基本都实现了人的素质转型,它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把中世纪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比喻为“从走兽向飞禽的蜕变”。就素质而言,这些华人已经实现了蜕变,所以其创新和转型才能够取得成功。按照中国创新和转型的目标,一定要从素质的蜕变着手,全力推动,继而利用这个杠杆撬动创新和转型。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本书才定名为《创新与转型的社会基础》。

把创新和转型置于经济、社会、政策、历史和国际的背景中进行研究,所需的知识是十分庞杂的,对笔者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笔者是理工科背景的读书人,研究经济、社会、历史和国际问题,所需的知识都是自学的,缺少科班专家的广度和深度,对许多问题的讨论也不得不浅尝辄止。然而,笔者对自己所持的独立思想颇为自信,对探究社会问题根源的信念比较执着,对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和大国复兴的前景十分关切。正是这种自信、执着和关切的驱使,本着“找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这个态度,才能够让笔者不昧粗陋,把这本不成熟的书献给社会。书中一定有许多谬误,请识者指出,以便再版时改正。

书中的部分内容从网上引用,都标明了出处,谨向这些作者们表示感谢。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浦东科委的孟德庆、胡蕾同志做了大量的协助工作,原实习生蔡莹莹等同志帮助查阅编辑了部分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概论	1
一、三则寓言的启示	1
二、真理标准与利益冲突	9
三、创新是一种创造财富的方法	12
四、转型的四个层次	17
五、国民素质决定着创造财富的终极能力	18
第二章 创新释义	25
一、创新、技术创新和自主创新	25
二、专家们对自主创新的看法	28
三、自主创新与区域发展方式	31
四、创新体系的分类方法	34
五、衡量创新体系绩效的标准	38
六、创新型国家的根本特征	50
第三章 产业创新的国际经验	55
一、知识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基础	55
二、工业起源与财富创造的新方式	66
三、产业升级与创造财富方式的持续更新	73
四、美国的产业革命和新经济	76

五、日本、台湾地区的跟随式创新	81
六、财富创造是大国崛起的直接推动力	85
第四章 创新致富所需的社会环境	92
一、中国人的财富观	92
二、锻造西方人财富观的六大社会运动	94
三、社会伦理	100
四、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102
五、社会诚信	108
六、社会进化力	110
第五章 创造财富能力升级的制度基础	121
一、知识产权制度	121
二、公司制	128
三、风险投资制度	133
四、信息对称性与会计制度	141
五、市场经济与贸易制度	143
第六章 中国转型的艰难与希望	146
一、农业文明的辉煌	146
二、自我封闭与“夜郎自大”	149
三、阻碍中国转型的观念文化和制度因素	152
四、中国古代科技思维的特点和局限	156
五、西风东渐与中日转型	160
六、香港的创新模式：中国人思维转型的样板	187
第七章 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转型和博弈	197
一、经济需要转型的原因分析	198
二、自主创新与国民利益最大化	208

三、区域发展动力的转型	217
四、解决好政策指向的问题	222
第八章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方略	228
一、加强社会核心价值观中的创新导向	228
二、夯实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基础	248
三、提升创新各要素的能级	252
四、构建全社会合作共赢的理性	274
五、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钥匙	281
六、用进取的精神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	286
七、构筑以创新为导向的社会环境	288
第九章 浦东新区的实践与展望	293
一、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	293
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95
三、浦东新区创造财富的产业	298
四、有浦东新区特点的创新道路	301
五、反思与展望	310
六、浦东新区未来创造财富的三条路径	313

第一章 概 论

一、三则寓言的启示

有一则盲人摸象的寓言说^①：

在久远年代以前，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国王，名叫“镜面”。在他的国家里，除了他一人信奉佛法的真理之外，臣民们却信仰那些旁门左道，就好像怀疑日月的光明，反而去相信萤火的微亮一样。因此，这位国王常常感到很苦闷，他想：“我总得想出一个办法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舍邪归正才好！”有一天，国王突然召集他的臣子说：“你们去把国境内所有生下来就瞎了眼睛的人，找到宫里来吧！”于是这些臣子们便奉命分头在国内遍处找寻，隔了不多几天，臣子们都带着寻找到的瞎子回来了。镜面王很高兴地说：“好极了，你们再去牵一头象，送到那些盲人那里去吧！”许多臣民听见了这个消息都十分奇怪，不知道国王今天将要做些什么事，因此，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赶来观看。

镜面王在心里暗暗地欢喜：“真好，今天该是教育他们的机会了。”于是他便叫那些盲人去摸象的身体：有摸着象脚的，有摸着象尾的，有摸着象头的……

国王便问他们：“你们看见了象没有？”盲人们争着说：“我们都看见了！”国王又问：“那么你们所看见的象是怎样的呢？”

摸着象脚的盲人说：“王啊！象好像漆桶一样。”摸着象尾的说：“不，它像扫帚！”摸着象腹的说：“像鼓呀！”摸着象背的说：“你们都错了！它像一个

^① 摘自《觉讯月刊》1952年第4期。

高高的茶几才对!”摸着象耳的盲人争着说:“像簸箕。”摸着象头的说:“谁说像簸箕?它明明像一只笆斗呀!”摸着象牙的盲人说:“王啊!象实在和角一样,尖尖的。”……

因为他们生来从没有看见过象是什么样的动物,难怪他们所摸到的,想到的,都错了。但是他们还是各执一词,在镜面王的面前争论不休。

于是,镜面王哈哈大笑地说:“盲人呀,盲人!你们又何必争论是非呢?你们仅仅看到了一点,就认为自己是对了的吗?唉!你们没有看见过象的全身,自以为是得到了象的全貌,就好比没有听见过佛法的人,自以为获得了真理一样。”接着国王又问一般来观看的人说:“臣民们啊!专门去相信那些琐屑的浅薄邪论,而不去研究切实的、整体的佛法真理,和那些盲人摸象,有什么两样呢?”从此,全国臣民便舍邪归正,都虔诚地信奉佛教了。

这是一则在国内广为人知的寓言,也是家长教育孩子、教师教育学生的教材。就笔者的观察,中国人对待这个寓言的态度,就像对待其他智慧一样,具有双重性,在写文章、做报告、应付考试时,都是重视的,思路也清楚,立场也正确;但是在个人的生活和实际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忘掉了这个寓言智慧的启示。

本书的中心议题是创新和转型。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经历了从明朝中早期开始的约 500 年的闭关锁国^①。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开始被迫对外开放。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在真正拥有主权的情况下,平等地、有选择地对外开放。至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才开始对内改革、对外实施平等的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开放。中国实施被迫的对外开放有约 170 年时间,平等有选择的对外开放有 62 年时间,改革开放只有 33 年时间。无论是 170 年、62 年还是 33 年,和 500 年比起来,都是比较短的一段时间。

最近 33 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基本的经验就是改革开放。历史已经证明了,如果只开放不改革,后果往往就是引狼入室。只有在改革过程中的对外开放,才能够促使中国的社会产生脱胎换骨地转变,获得新生。而改革和中国的

① 在历史上,伴随着对外扩张和外族侵略,中国是不缺少对外开放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闭关锁国体现了国家的实力,如果没有实力,想锁也锁不住。闭关锁国与思维僵化相结合,封堵了产业进步的可能性,丧失了发展机遇,从而种下了近代中国遭受的民族悲剧的种子。

传统文化是抵触的。在先秦时代,中国文化还具有对立统一的特征,例如,儒家尚古,主张“法先王”;法家重今,主张改革。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异军突起,吞并六国,统一海内,生动地展示了改革的威力。但是由于在生产力落后的背景下,集权体制的威力容易被统治集团滥用,巧取豪夺造成民不聊生,秦朝在统一海内后不久就土崩瓦解,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感觉需要用一套僵化的意识形态对集权体制进行规范,于是“独尊儒术”就应运而生了。自此以后,中国的文化就呈现“一枝独秀”的特征,不再有对立统一,使中国文化变成了一个尊古的文化,一个讲究秩序的文化,一个逆来顺受、默认现实的文化,对任何变革都深恶痛绝。改革一词,在中国历史上浸透着辛酸和血泪的沉重。商鞅、王莽、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皇帝都是改革者,他们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原始创新”,有利于增强国力或实现一种社会理想,但是由于改革的利益攸关方博弈的不均衡,改革者大多没有好下场,或被五马分尸、或被挫骨扬灰、或被口诛笔伐。所以,中国人都应该由衷地感激邓小平同志把中国带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步成功,归功于邓小平同志无畏的勇气、高超的驾驭艺术,以及构建一个可持续格局的远见卓识。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初步成功,并且在争议和交锋中保持向前的势头,最关键的原因是改革奉行了帕累托原则,即改革总体上使全体人民在经济上受益,没有人因为改革在经济上受损,只是有人受益多一些,有人受益少一些。

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转型和创新的过程。转型和创新的基础,就是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运用。在吸收学习的过程中,有多少人能够说自己不是“盲人摸象”中的盲人呢?搞科学技术的人说“西方国家就是技术先进”,搞经济研究的人说“西方国家就是市场经济”,搞公司治理的人说“西方国家就是股份制”,研究制度比较的人说“西方国家就是制度先进”,搞产业发展的人说“西方国家就是高科技产业”,搞转型的人说“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比重占70%以上,我们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初期,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出现这种“盲人摸象”式的学习方式还可以理解的话,在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今天,再不把学习对象进行整体的审视,对发展和创新的规律进行整体把握,不对基本战略战术进行顶层设计,就是有负于时代的重托。

再看日本,一个与中国基本同时代被迫对外开放的国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

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走上了一条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道路,取得了不逊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发展成就。日本在二战历经毁灭性打击以后又在 20 年内实现复兴,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尽管“军国主义”伴随明治维新而沉渣泛起,但我们应该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对其创新、发展和转型的经验进行考察和学习,值得借鉴的是其整体思维和顶层设计。尽管日本军国主义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仇恨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只有通过后代人的努力,在创新、发展和转型上实现对日本的超越,才是真正对祖宗负责的态度,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日本不少人奉行“弱肉强食”,鄙视弱者,崇拜强者。它曾经对中国的唐朝顶礼膜拜,现在又对美国顶礼膜拜。对当今的中国来说,日本就是一本客观的“镜子”,只有当中国的创新、发展和转型达到让日本人崇敬的水平时,才能够算得上成功,这是衡量中国改革开放和创新转型是否大功告成的一个直观标准。

有一则夜郎自大^①的寓言说:

秦汉时代,我国西南地区居住着许多部落。汉初,由于朝廷忙着平定内乱和对付北方匈奴的侵犯,没有余力顾及遥远的西南地区,而西南的这些部落也从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西南地区的这些部落都很小,他们散住在山中、林间。其中有一支名为“夜郎”的部落,就算是很大的了。夜郎部落有个首领名叫多同。在他眼里,夜郎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了。一天,他骑马带着随从出外巡游,他们来到一片平坦的土地上,多同扬鞭指着前方说:“你们看!这一望无际的疆土,都是我的,有哪一国能比它大呢?”跟随一旁的仆从连忙献媚说:“大王您说的很对,天下还有哪一国比夜郎更大呢!”多同心里沾沾自喜。他们又来到一大片高山前,多同仰起头,看着巍峨的高山说:“天下还找得到比这更高的山吗?”随从连忙应和说:“当然找不到,天下哪有比夜郎的山更高的山呢!”后来,他们来到一条江边,多同跳下马来,指着滔滔江水说:“你们看,这条江又宽又长,这是世界上最长最大的河了。”随从们没有一个不同意的,都齐声说:“那是肯定的。我们夜郎是天下最大的国家。”这次出游以后,夜郎国的

^① 作者陈金安,见百度文库。

人更加自大起来。

汉武帝时候,武帝派使者出使印度,经过夜郎国。夜郎的首领多同从没去过中原,根本不知道中原是怎么回事。于是他派人将汉朝使者请进部落帐中。多同问汉朝使者说:“汉和夜郎相比,哪个大些?”汉使者听了多同的问话,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回答说:“夜郎和汉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汉朝的州郡就有好几十个,而夜郎的全部地盘还抵不上汉朝一个郡的地盘。你看,哪一个大呢?”多同一听,不禁目瞪口呆,满脸羞愧。

夜郎自大这个寓言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没有超过盲人摸象对中国人的影响。许多中国人在演讲时、在应付考试时,都能够正确地对待和克服夜郎自大的问题。然而,在思维模式中,在生活中处理具体问题时,却往往被自觉或不自觉地抛之脑后,而陷入夜郎自大的泥潭。

清朝的乾隆皇帝所患的就是极度的自大症,是一个典型的“夜郎”。他因为具有对辖区内人民的绝对控制权,其思维就依照历史的惯性,沉醉在“天下共主”的迷幻之中。对于英国马戈尔尼使团带来的代表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的礼物,如地球仪、钟表、火器等,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兴趣,甚至连听取详细介绍的兴趣都没有。笔者曾经拜访历史小说家二月河,他对自己创作的关于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著作有自己的解释。尽管这些著作得到众多读者的交口称赞,但二月河仍将其归纳为“晚霞三部曲”,晚霞固然瑰丽,但它是黑暗的前奏。“晚霞”二字,透出了二月河作为历史学家的清醒。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一“昌”一“亡”,背后的机制是进步的力量和落后的力量之间的博弈。世界文明发展到今天,以地域大小来决定实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原形的“夜郎”已经很少了。在当今的中国,“夜郎”的主要形态已经转化为对自身实力的“自恋”和对他人的漠视,以及对“硬实力”的膜拜和对“软实力”的无知。当今的世界,已经进入了硬实力和软实力并驾齐驱的时代,像成吉思汗那样靠金戈铁马的硬实力征服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靠高楼大厦、商品横流已经不足以显示发展成就了,只有硬实力和软实力均衡发展,才是时代的潮流。对中国人来说,素质中的“硬”、“软”失衡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具备财富、权力、资源等硬实力的人一般都不具备软实力,具备文化、规则、见识等软实力的人一般都不具备硬实力。而且具备硬实力的人对软实力往往视而不见。素质中的硬软失调是一种病症,类似